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叛逃美国内幕

1978年4月6日,一辆从美国纽约出发的小轿车抵达宾西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从车上匆匆走下一个中年人,直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座安全楼。1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出一条特大新闻:《苏联公民、瓦尔德海姆的助手谢夫钦柯在联合国叛逃!》。

平步青云

1949年9月1日,谢夫钦柯考入了苏联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1954年谢夫钦柯大学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1955年的一天,担任《国际生活》杂志主编的葛罗米柯之子、谢夫钦柯的同班同学安纳托利建议谢夫钦柯和他一起合写一篇文章,这一天赐良机使谢夫钦柯很快结识了葛罗米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不久之后,他就成了葛罗米柯的私人秘书。1956年,谢夫钦柯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并立即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主管裁军的特别科工作。1960年9月,赫鲁晓夫亲率苏联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谢夫钦柯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有一天,谢夫钦柯和赫鲁晓夫进行了单独谈话,陪他玩掷森林盘的游戏,并和赫鲁晓夫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不久,谢夫钦柯被提升为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

1972年12月的一天,葛罗米柯把谢夫钦柯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有人向我建议提名你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候选人,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明天答复我。"于是,1973年4月,年仅43岁的谢夫钦柯被任命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投向西方

谢夫钦柯和妻子莉娜一样,非常喜欢纽约的生活,认为纽约比莫斯科自由得多,他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

1975年的一天,在一场外交晚宴上,谢夫钦柯悄悄地将一位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官员拉到一旁,"我有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求你帮助。"他尽量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我已做出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但我想事前了解,如果我投向美国,美国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我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谢夫钦柯强调。然而,美国人依然将信将疑,"好吧,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介入此事,不能让人再一次看见我们两人在一起,哪怕是在餐厅里。我会安排下一次见面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谢夫钦柯不仅向美国人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还帮助不少美国特工打入了苏联情报机构。

形迹败露

1977年初,苏联人开始感到惊奇,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苏联在限制武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和政策摸得那么清楚?随着美国政府在裁军谈判中继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预见性,莫斯科方面的怀疑也与日俱增。于是苏联最高首脑机关命令克格勃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到1978年,克格勃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能够提供情报的只有三个人: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里·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奥列格·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经当时的苏联政治局特别批准,克格勃使三人同时都收到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政府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同时对他们分别监视。结果,谢夫钦柯露出了尾巴。

1978年3月31日,一位同事约谢夫钦柯到苏联代表团,并悄悄告诉他有一封从莫斯科来的电报。电文称谢夫钦柯工作成绩突出,国内同意让他再留任两年。但有些事情需要他在方便时回莫斯科谈一谈,电文最后叮嘱谢夫钦柯不必着急回国,以后的几周时间里都可以。

来电使谢夫钦柯感觉自己已经被发现了。那么,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立即叛逃美国。

仓皇出逃

可克格勃人员几乎遍布联合国机构的所有角落,叛逃并非易事。

情急之下,谢夫钦柯忽然想起美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进行紧急秘密联络的电动剃须刀。于是,他马上拿出剃须刀,一接电钮,微电机开始"丝丝"作响,同时底部闪现出一行字幕:"明天子夜开始行动,在CB处有辆车等你。但是,你必须从联合国秘书处出发,一路上有暗哨保护,绝对安全。"

好不容易捱到天黑,谢夫钦柯驱车回到家中,将20万美元偷偷塞进妻子的衣袋里。然后,来不及与睡梦中的妻子道别,他便匆匆驱车赶回办公室,并化了妆。这时,在他窗子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红蓝相间的圆圈——这是约好的行动暗号。

谢夫钦柯取出手枪,将子弹压满,走进了茫茫的夜色。这位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在苏联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彻底走上了叛国出逃的道路。

摘自《军事史林》

曹墓不知何处去

曹操生前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建造了72座陵墓,谁也不知道他埋葬在何处。

曹操在丧葬上有别于历代帝王,他对自己的身后事,提出了"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

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比帝王低,为什么他不但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据说,曹操一生提倡节俭,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各种用过的布料,破了再补,补了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财物短缺,曹操不穿皮革制服,到了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为防止自己死后出现这种惨状,他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当然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他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抬出。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据诗曰:"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又据《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察,这也属假设。那它还有可能在哪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魏书》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吧。

摘自《文化报》

朱启钤:改造北京第一人

原先的北京,不是今天的样子,南来北去都得绕着皇城走,是谁把它变成了现在的格局呢?我们不能不说说这个不寻常的人物——朱启钤。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贵州开阳人。他出身边远寒微,生逢新旧更迭的乱世。

光绪三十二年(1906),朱启钤曾先后担任京师内、外城巡警厅厅丞。那时,一般贫贱或无身份的汉民是住不进内城的,朱启钤很清楚,当时清廷已危如累卵,他无意捕人帮凶,只是终日奔走内外城的大街小巷,揣摩五朝帝都市政布局的得失,谋划公安消防的设立。他首创了北京警察的市政基础建设。

朱启钤改造京城是以正阳门为重点,清除天安门广场的千步廊,打开皇城对北京南北交通的禁锢。

正阳门位于北京内城九门南垣的正当中,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是"国门",也称"前门"。前门是一组结构严谨、气势恢弘的城池建筑。它包括正阳门、箭楼、瓮城、正阳关帝庙、正阳观音庙、正阳桥和五牌楼。在内城九门中正阳门规模宏大,至高无上,门禁严格。正门终年不开,只供皇帝出巡,或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才开启。平时车马行人只能从瓮城两侧的"闸门"进出,而闸门是"向夕即闭"。有多重要的事也要等明天开城才能进去。

明代中叶以后,前门外商业发达。御道两侧迅速出现了鲜鱼口、肉市、粮食店、煤市街、珠宝市、布巷子、猪(珠)市口等街道。为进京应试举子修建的会馆在前门外就有一百余家。清初朝廷下令,茶园、戏楼、妓院只准在外城开设,就连热闹的灯市也从东城搬到了前门外。很显然,内城的固守与外城的繁荣形成极大的反差,进出交流的需要日趋急迫,高大坚固的正阳门成了北京城南北交通、内外交流的卡脖子瓶口。

比这更紧急的是,光绪二十七年和光绪三十二年京汉和京奉两条铁路的车站就建在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的跟前。京城人进出困难,四面八方来京的旅客,一下火车就堵在前门楼子跟前,交通"愈形逼窄"。昔日威武庄严的正阳门一时成了"拦路虎"、"绊脚石",正阳门非得改改"模样"不可。是拆,是改,怎么改,改成什么样,都是大问题。

朱启钤深知其难。改造正阳门不仅缺资金、少劳力,工程庞杂,而且有人会散布这是伤害"龙脉"、拆"祖宗基业"、"大逆不道"的舆论!工程一朝失误就会惹来塌天大祸,为后续的改造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

1915年6月16日,朱启钤冒雨主持了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他手持大总统颁发的特制银镐,(这柄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此镐至今仍在朱家收藏。)率先刨下了第一块城砖。由于他谋划得当,筹资有方,用人得力和赢得各界的广泛支持,工程进展迅速,当年年底全部完工,一次验收合格。

正阳门是怎么修改的呢?

首先是拆除了环联正阳门与箭楼瓮城的东西月墙;搬迁了月墙外的东西荷包巷两个占路小市场;在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门洞,东进西出;修筑了两条宽20米的马路,路边开辟人行道,还修了排水暗沟,导入护城河,防止雨季积水。

其次是保存并修饰了"工筑崇巍"的箭楼。朱启钤珍爱我国古建筑,他自费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古建筑遗产的学术团体。他考虑到瓮城拆除后的箭楼不仅要完整保存,还需加以修改装饰和美化,才能独立成章,并与前后建筑呼应。

他思想开放,请京汉铁路的法国工程师罗克格设计,在箭楼东西两侧增筑弧状月台,并在外墙饰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楼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阳华盖,每扇窗户都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楼的阶梯曲折别致,东西各82级,全用磨光的大条石砌成。护楼与护梯的汉白玉石栏杆,采用传统造型,玲珑剔透,不失皇城风韵。他还购置了3对大石狮,摆放在箭楼东西楼梯口和正阳门前。

朱启钤很重视修改正阳门工程的环境治理。拆除瓮城和其他障碍物,共清渣土8.8万立方米,在当时运走这样大的土方量是个难题。他充分利用大总统特令和曾任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的有利条件,要求京汉、京奉两铁路,将道轨铺设到东西瓮城跟前,将渣土及时装车,用小火车头沿东西两线分别外运到西便门和东便门外的蟠桃宫,垫平铁路两侧的洼地,展宽民用土地的面积,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也缩短了工期。

修改正阳门工程,不光疏理了交通拥堵,更为北京从清朝帝京转变为民国首都塑造了鲜明亮丽的新形象。千万中外旅客走出火车站立刻会被高大的前门楼子、宽敞的绿地和婆娑的绿树所吸引,留下深深的印象。

解放后,朱启钤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周总理多次到东四八条寓所看望朱启钤,征询天安门广场建筑配置的意见。朱老深有感触,他对家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见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1964年2月26日朱启钤病逝,周总理出国,委托统战部送了鲜茉莉花圈。他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摘自《人物》

李鸿章打架

咸丰八年秋,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同时,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也常来会商,一时间,大佬云集,蔚为盛况。大佬们经常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一旦形不成共识,则常能擦出文斗的火花,甚至还演出武斗的闹剧。

公余,众人围坐扯闲谈,扯着扯着,总不免搞搞地域攻击——今日网络论坛,若人气不旺,只要有人上帖谈谈上海人如何如何、北京人怎样怎样,点击率、回帖量必陡然上升;与此一个道理——有一次便扯到安徽人身上,语多调笑。既称湘军,在座当然以湖南人为多,为安徽辩护的就只有李鸿章,他孤军奋战,苦苦支撑,无奈敌方人多势众,渐渐就显出颓势。据网络辩论可知,每届此时,泛泛而谈的地域攻击往往会演变为问候对方辩友直系亲属的人身攻击。鸿章未能免俗,以彭玉麟父曾在安徽做官为"机会点",开始阴一句阳一句的反扑。这还了得,竟骂到老子的老子头上,一贯火暴的彭玉麟二话不说,"遂用老拳",玉麟个小,不到一米七,一米八几的鸿章怎会怕他,"亦施毒手"。于是,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相扭扑地",斯文尽丧。

摘自《文学故事报》

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

李 铁

虽然我们深感物质世界是不容置疑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宁可相信一些虚幻事物的存在,并在内心为它们预留着共同分享这个世界的空间。

一次,我在经过甘、川相邻地段一个名叫木道那的藏族寨子时,一群人正聚集在寨口一棵古杨树下,群情激奋地呵斥一个小男孩儿。那男孩委屈地抹着泪,手里拖着一把割草用的长柄镰刀,看上去很无辜的样子。我觉得那样对待一个孩子是不公平的,就问其中一位年长的男人,难道他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事了吗?

那人指指老树说,你看看吧,他做的好事!

那棵老树上挂满了被雨水冲刷得泛白的经幡,还涂着不少酥油,酥油上粘着一团一团的羊毛。在一段空白树干上,有一道刀砍过的痕迹,新鲜的茬口上正在往外流水。原来,拿镰刀的小男孩路经此处,无意地向树上砍了一下,恰好被大人们看见了。他们认为树是不能想砍就砍的,何况那棵树不是一棵普通的树,而是护佑着地方平安的山神的寄魂树!

人们说,那伤口不光是砍在树上,也是砍在山神的身上啊。

我仰头看着那老态龙钟的杨树,有着枯瘦扭曲的枝干和稀疏的叶片,树冠上三两个鹊巢岌岌可危。除此以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可我相信在寨子里人们的眼中,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些非同寻常的鸟儿栖息于树枝,它们无形的翅膀鼓动着透明的空气,正在给整个寨子带来幸福和吉祥。

是的,在一些偏远村寨,那些看不见的,或者被我们认为是虚无的东西,仍被供奉在人们心灵的殿堂上,并被敬畏的嘴唇传诵得鲜活生动。从古到今,那样的鸟儿一直不知疲倦地飞翔于民间的天空下,因而在青藏高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相对应的神灵,即使那些丑陋的石头和树木,也有人一样的尊严和灵性。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事实:即使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国营林场的伐木工用油锯剃了光头,而被村民们保护着的"神山"上,尤其是在寺庙的附近,成片成片的树木依然茁壮而茂密。

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但隐藏于我们的意识里,某种时间便能够真实地显示出来。正是这种对自然的神圣感和敬畏,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不断地使我们放弃自私而非分的念头。

旅游业兴盛以来,香格里拉(安多藏区称为香巴拉)成为人们追寻的理想境界,希望那仅仅是佛经中提到的或小说里描绘的世外桃源,在现实中能够找到确切的对应。在青藏高原,据说那样的秘境已经被声称找到了,而且正在产生着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是在国外,人们也试图将那乌托邦据为己有。印度国家旅游局曾经宣布,香格里拉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的巴尔蒂斯镇:尼泊尔人也不甘示弱,声称他们的边陲小镇木斯塘为香格里拉;俄罗斯人则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辗转寻找香格里拉的蛛丝马迹。可实际上,香巴拉作为佛教理想中极乐世界的象征,无论把它放在哪一块现实的土地上,都会显得牵强,甚至会玷污了它本身的圣洁。曾经有位名叫吉米·哈特的美国人,则意外得到了另一条到达香格里拉的"路线图"——他在尼泊尔境内寻找香格里拉时,当地一位老喇嘛笑着说:到处找什么呢?香格里拉就在你的心中啊。

如今已经没有人会相信山神,更不相信山神会把灵魂寄托在某棵老朽的杨树上,但我知道,那是一种心灵的真实。

摘自《散文》

和你一起奔跑

扬 雪 编译

吉姆·雷德蒙做了任何一位父亲都会做的事。他的孩子需要帮助,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场上,虽然有数千名警察和许多电子防护设施在保障着比赛的安全,但是,当一位父亲看到儿子的梦想正在破灭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哪一个赛场是安全的了。

"当时,我刚跑出几步,"来自英国的运动员德里克·雷德蒙说道,"突然,就听扑通一声,我猛地摔倒在地。"

26岁的德里克,为了能够进入这项400米跑的半决赛至少已经等了四年。在上届奥运会上,他的跟腱受了重伤,但是他一直都咬牙坚持着,直到比赛开始前的一分半钟,他才无奈地放弃了比赛。

那届奥运会后,医生对德里克的双脚跟腿实施了手术,手术一共进行了5次。术后,他又回到了赛场。在一次比赛中,他头两轮先后跑出了45.02秒和45.03秒的成绩,那也是他近5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我第一次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真的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哪怕没有获得任何奖项。"雷德蒙说,"我的感觉非常好,但是,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刚跑到赛程的一半,雷德蒙突然倒了下来,他右腿的跟腱又受伤了。

但是,不大一会儿,雷德蒙却咬着牙,挣扎着站了起来,并沿着第5跑道步履蹒跚地往前走。此刻,这项比赛的胜利者——卫冕冠军刘易斯已经跑完了全程,并且正朝着运动员的通道走去。而其他6名选手也已经跑完全程,离开了跑道。但是,这项比赛却并没有结束,因为,最后一名参赛者还没有跑完全程。他仍在继续前行着。

就在这时,德里克·雷德蒙的父亲吉姆·雷德蒙正坐在奥运会场看台的最高处,紧张地注视着比赛场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了德里克摔倒了。这位来自英国北安普敦郡的一家机械修理店店主,49岁的雷德蒙,迅速地跑下了看台,来到了赛场的跑道上。

"当时,我所想的是,"吉姆·雷德蒙说,"我必须把他带到终点,这样,他就可以说他跑完了半决赛。"

这时,人们都意识到了德里克·雷德蒙正在与他的生命赛跑。整个看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们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为他欢呼,向他致敬。

当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吉姆·雷德蒙追上了儿子,并且伸出胳膊搂住了他。德里克顺势依靠在爸爸那宽厚的右肩上,禁不住哭了出来。但是,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前行。一位引导员还是走到他们面前,试图恳求吉姆·雷德蒙离开跑道,尽管他知道这是一项根本就无法完成的使命……

最终,这对父子臂挽着臂通过了终点线……

摘自《讽刺与幽默》

打破的鸡蛋

张霄峰 编译

在奶奶的厨房里,什么都不会浪费。她年轻时生活在俄罗斯,正值食物匮乏的年代,有时全家都要忍饥挨饿。日久天长,奶奶学会巧妙运用手头的有限材料节俭度日。

也许正因如此,来美国后,奶奶的厨房总是满得仿佛要溢出来。她教女儿从小养成习惯,厨房里的任何食品都要多备一份,以防不时之需。虽然她在我出生前就已去世,但母亲作为她的长女,将她的持家之道转授给我。即使食物丰裕也不意味着能浪费,在我们家任何食物都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甚至袋泡茶也要晾干复用。

我很小时就听过奶奶的冰箱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家族里被反复地讲述。奶奶的冰箱总是塞得满满的,每一个搁物架、每一个角落都得到充分利用。如果有人——通常是小孩——打开冰箱时不够小心,就会有鸡蛋掉出来,打碎在厨房的地上。奶奶的反应一成不变,她总是满意地看看打破的鸡蛋,"哈哈,"她会说,"今天有鸡蛋糕吃了!"

生活中总有痛苦和损失,正如鸡蛋会被打破一样。同样,就像祖母不舍得浪费每一个鸡蛋,生命对我们太珍贵,容不得一点浪费。我16岁时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妈妈教给了我这个道理。当时她没有拥我入怀,也没有抚慰我,而是握住我的手,坚定地说:"我们会做块鸡蛋糕。"

许多年后我的病才有了治疗的方法,但在那一刻我已知道,这就是我应有的态度。

摘自《意汇》

飞在天上的日子

蓓蓓晃

那一年,初中毕业前夕,我报考了一所培训空姐的中专。

5月,当我走进巨星演唱会般人潮涌动的工体时,完全懵了——女孩们10个一组,进到小屋里,3分钟后出来,留下一个。这是初试。当考官叫出我的名字时,身边一个女孩当即哭了出来。随后,是繁复冗长的体检,场面混乱,不断有女孩红着眼圈投向等在门口的父母怀里——淘汰她们的理由千奇百怪,某人膝盖关节间的缝隙太大,不适宜长时间站立;某人耳鼓长得不合理,承受不了高空气压;某人太胖;某人太瘦;还有一个更离奇,仅仅是因为腹部残留一块阑尾炎手术的疤痕,就被迫与蓝天失之交臂……

真正进入那所学校后,我才听说,我们这60个人,是5000多人中硕果仅存的。

学校位于机场工作区,我每周坐着小巴往返一次,对司机说:师傅,乘务队给踩一脚。后来,每到周末,学校门口的私家车越停越多,日渐将小巴挤得没地了。奔驰、宝马夸张了些,但也没有低于本田、欧宝、沙漠王的,里面的男人虽谈不上英俊,却也都还年轻,看着属于自己的那张笑脸蹦蹦跳跳跑过来,打开车门,一把揽进自己的怀里。

为这事,班主任没少开班会,但没用。化妆包里的CHANEL、YSL越来越多,身上的羽绒服也换成了柔软细嫩的皮衣。就像写诗的人都牛气哄哄,飞在天上或是准备飞在天上的女孩全都华丽嚣张。

毕业后,进了北京一家航空公司。北京的空姐在航空界有一号,用天津话讲叫"哏儿",她们脾气生猛,精力充沛。也碰上过更"哏儿"的乘客,气得人哭笑不得。除夕之夜,北京飞深圳,一个中年男人左手捧一次性饭盒,右手拎皮箱,刚一坐定就拦住我,问:你们有微波炉吗?我说只有烤箱,您要热什么?他边说边打开饭盒;这几个饺子是我的朋友专门给我包的,还特地给送到机场来……

我拿到后厨房,启动烤箱,嗬!还是韭菜馅的。起飞后,安全警示灯刚一灭,男人就过来了:饺子好了吗?

吃完饺子,男人又开始要茶水,嘴里还念叨着,太香了,就是盐搁得有点多。

终于消停了。飞机开始下降,男人突然又出现在厨房口,神色慌张,问我:你们还能联系到北京机场吗?一打听才知道,此人原本是一手拎皮箱,一手拎行李箱,自打从朋友手里接过饺子,行李箱的事就忘光光了。

离开航空公司以后,突然就患上了恐飞症,能坐火车绝不坐飞机,家人朋友要是乘机出行,我简直能焦虑得抓狂。

可是在工作时,从没怕过,或者说,从没想过要去怕。有一次,广州夜航,进入雷雨区了,舷窗外黑漆漆的,夜空中不时劈出一道金色的利刃。飞机颠簸得厉害,几乎站不起身来。突然,像毫无准备被推上了过山车的最高峰,飞机急速下降,估计,几秒钟内足降了500多米。所有人都往上升,离开了坐椅,客舱内安静异常,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

记忆中,只有一次是真被吓着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客舱里,飞机停在停机坪上。舷窗外,不远处停着另一架飞机,尾翼上印有我们航空公司的标志,还有一串数字:1308,我看到一个要好的同事在舷窗里,冲我挥手。然后,那架飞机起飞了,笔直地飞向不远处的山峰,一头撞上——次日,我要飞的航班号是1308,那座机场,北面是山。

很难说,一份职业带给人的心理暗示有多大,告别了天空,我也就不再华丽嚣张。像淡忘每一座我到过的城市一样,我逐渐淡忘了这一段空中的旅程,直到韩国空难。

理论上,乘务员的座位全部设置于机舱门两侧,最有利于逃生,而一名空姐对一架飞机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水手对他的航船。但那场灾难中,除了两名男空乘,余下的6名空姐全部遇难。我相信,那些华丽嚣张的空姐,彼时从容淡定。一位幸存者这样描述:我看见她被压在坐椅下面,上前去拉她,她对我说,你快跑吧……

那套明亮的天蓝色制服还保存在衣柜里——虽然航空公司已被它淘汰,换成了更端庄的深蓝色。我已经没有机会再穿它了,却也舍不得丢弃。就像女孩的婚纱。

摘自《文学故事报》